

不均衡的写作

□方 岩

——

《朝霞》的结尾,歌声响起: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这是1978年之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小说的主人公阿诺说他梦见了马思聪。马思聪正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他在“文革”爆发后的第二年(1967年)途经香港远走美国。彼时的少年阿诺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开始步入“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好年华。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语出自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对数千名留苏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57年,彼时的吴亮大概只有两三岁。伴随着“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本该是红彤彤的“朝霞”所隐喻的光明和希望。



如今,再从代际角度来谈论诗歌,似乎就有些落入俗套了,“70后”与“80后”诗人群落,越来越分裂为独立的个体,他们的创造大都立足于个人经验,即便是碎片化的,也仍然有其真诚的个性,而他们走向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完善与成熟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熊曼的诗,我们会发现她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并以此主体精神行使了个人对写作的担当。她已经游离于代际经验,而有了属于自己的趣味和美学,依靠这些年写作的积存,她从最初的技巧实验中走出来,不断地更新表达情感的方式,且保持了与这个世界某种温暖的关系。
以其写作的精神体量和密度观之,熊曼的诗,基本上是立足于日常经验范畴里的探索 and 建构。她为生活而写,为人生而歌,那近乎童话的生动描绘,是其固有的性情所致,还是因她做了母亲而有的的一种柔软所带来的?我们不得而知。至少,她没有刻意与生活保持距离,去抵抗那些黑暗与幽闭。她以诗人的敏锐,写出了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美好,那不是凭借简单粗暴的对抗就可落实的。她以自我想象完成了对生活的提炼,这不仅仅是体现为日光之下的平淡物事,更重要的是,她在曼妙的笔触中投射了一种精神景观,或舒缓、或柔情、或优雅、或平静,总之,那是一种富有耐心的写作。“我指给他看/低处的油菜,小麦,菠菜,萝卜/高处的泡桐,香樟,苦楝,桂树//我牵着他,走在绵软的泥土上/他还不能讲一句完整的话/但已学会张开双臂表达愉悦//一只艳丽的公鸡出现在远处/他挣脱我的手去追赶/多么熟悉的场景……”诗人与孩子之间的交流,是通过拥抱自然的方式达成了更内在的沟通,这种方式传递的是母爱与诗意交织的信息,它不需要我们去寻找破译的密码,只要有过相似的经验,就能领悟这柔软创造中的鲜活之感,以及关乎生命成长的微妙情意。“等待它落在乡家的田野上/在清晨,我的父亲搓着通红的双手/把萝卜和白菜连根拔起//等待它落在城市肮脏的街道上/我的儿子刚刚学会奔跑/还不敢松开我的手//雪越下越大,我带他来到楼下/堆一个胖胖的雪人。我们绕着它跳啊,笑啊/把寒冷推远……”多么温馨的场景,这看似自然的馈赠,其实更是人伦之乐。诗人的感受就在这平常但不无美好的氛围中被定格在了画面中,它已经属于历史,并获得了诗性存在的可能。
我一直认为,诗歌是慢的语言艺术

可是几年之后,等吴亮到了少年阿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年纪时,他发现,他和阿诺们只能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如同游戏到处闲逛”,“浑浑噩噩地,抬头望太阳都是灰乎乎的”,只能“没有目标地乱走”。
1974年,“革命”日薄西山之时,也是吴亮和阿诺们的少年时光接近尾声的时候,上海这座城市诞生了一本叫做《朝霞》的文学杂志,这本杂志受控于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朝霞”的隐喻愈发显得诡异。到了1976年,吴亮和阿诺们似乎开始重新燃起希望:“朝霞满天,一个新世界将在悲剧之泪中诞生。”
后来,那个叫崔健的歌者如此形容这代人:
“看那八九点钟的太阳
像红旗下的蛋……
现实像个石头 精神像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 可蛋才是生命……
若问我们是什么 红旗下的蛋”
很多年过去之后,吴亮终于可以坐下来聊聊他和他这代人的“朝霞”时光了。他说:“写作欲望被一种难以忘怀的

童年经验唤起”。于是,便有了这部长篇小说《朝霞》。
二
词组、短句、没有标点没有段落泥沙俱下的长句;情节的片段、跳跃的叙述、思想的碎片、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不同文类间的挪用、嫁接、拼贴,人称、视角的随意更换,普通话、沪语混杂,写还是不写、写什么、如何写、为什么写等关于写作本身的“元叙述”,这些因素在文本中相互交织,甚至是相互消解。于是,小说阅读的经验、小说理论的规训在《朝霞》面前统统失效。对此,一向自信雄辩的吴亮心知肚明,他用其一贯气势磅礴的语气,斩钉截铁地回应:“不均衡的写作就是最潮流的写作,刻意的不合常规,引人瞩目的风格先要招致讨厌,不习惯,打破惯例,绝不讲究古典式均衡也不在乎阅读断断续续……”
三
对待“不均衡的写作”的最好办法,便是“不均衡”的阅读和评判,即“揭露”吴亮的野心和匠心。
把《朝霞》描述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便是:阿诺与他的朋友们在“文革”十年间的经历。其间,他们从小学升入中学。不久以后,有的上山,有的下乡,有的留在城市务工,有的赋闲在家。这群人时而相聚,时而离散。这种描述似乎符合我们关于“文革”的想象和阅读期待。只是吴亮要“故意与一部分读者偏执地关心人物情节的阅读习惯过不去”。所以,在直接涉及这群人的叙事片段中,没有革命的激荡也没有离散的悲情。在革命的风暴中心上海这座城市中,这群人总是能找到各种机会相聚,他们喝酒、聊天、“轧朋友”、交流读书心得。简而言之,“文革”故事的外衣下尽是心不在焉庸庸碌碌的日常。由此,这个看似正统的“文革”故事最终被细节和纹理消解。当革命的城市中游荡



情”,这或许是她阶段性人生最大的收获,不管她后面写到多“悲伤”的事情,这已经构成了生活继续下去的前提。熊曼将日常所见所闻所感,悉数搬到了诗中,这种复制生活的做法,究竟对她意味着什么?从诗的层面看,她在经验世界中品味那些过往的记忆,这种诗性转化是否可以被客观呈现所替代?在诗人看来,这种转化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开放的个人经验在她与自我的对话中不会贬值,相反,它可能会增加诗歌的生动感与丰富性,并延长和拓展个人记忆在修辞转换上的意蕴空间。
相比于那些带着浓厚说教意味的诗,熊曼更在意的是个人直觉与悟性,以及对日常的体验,所以,为人生的写作当属她对自己的准确定位。她近年来的诗歌可能与家长里短的琐碎见闻和经验有关,她愿意去恪守“人心”的规则,而没有选择像同龄女诗人那样,去表达某种尖锐、破碎和悲苦,去试图靠近那些外在的先锋,这是其性情使然。作为诗歌编辑,她对各种风格的作品定是相当熟悉,可她还是依循和服从了内心,在温婉中出示对人生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当然,这并不代表诗人没有困境与焦虑,但她在写作中并未放大这一面,也有可能是将其隐藏在了更深的洞察里。“我记得那是一个夏日/一轮落日在天边燃烧/灰烬落满大地//我记得



着一群不革命的人的时候,文本的裂缝就此张开,吴亮的野心和匠心也开始渐渐浮现。
吴亮说:“写出一种在那个时代似乎不可能的例外生活,那是错觉”。这是他欲盖弥彰的误导之辞。因为吴亮始终在掩盖真相:他只有把阿诺们变成城市里的失魂落魄的游荡者,风暴中心的冷眼旁观者,他方能从容地、缜密地审视自己与那段历史、那场革命的复杂关系,包括他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期待。所以吴亮最后承认:“在事后的阿诺自己看来,无非是通过某种意外的经历,把阿诺放在某个可以自我观察的位置,进行新的定义,并且凭借这个定义,将自己塑造为一种更符合他所意愿的形象。”“意外的经历”其实是一种隐喻,是吴亮刻意保持的思考姿态:“叙述者虽置身在外,好像一切与他无关似的,深思熟虑,但愿他不是个假装的局外人,确立一个他觉得可以采取的视角,保持冷观的姿态,以乏味的语调吸引倾听,希望听者的注意力不要过于旁逸分神……叙述者,他态度的力度将决定叙述的能量可以无穷尽地保持下去,这个离题的插叙。”
无处不在的“离题的插叙”是《朝霞》中最具魅力的地方,而制造“离题的插叙”的最重要的媒介便是阿诺们的日

常言行。因为,阿诺们的日常细节和庸常事物,一端联系着具体发生过的历史和历史进程中的具体经验,另一端又联系着吴亮的思考。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关于阿诺们日常细节、庸常事物的描述后面,总是跟随着宏大而又具体的思想、哲学命题的讨论。但是也只有当阿诺们居于事件中心而又心不在焉时,吴亮才能以公正、客观的批判者、思想者的面貌出现了。因为,此时的吴亮认为他已经通过阿诺们的眼睛洞悉了真相、掌握了细节,所以,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将这些转变为滔滔不绝的思辨。不难发现,读书和讨论是阿诺们很重要的日常行为,这个行为所涉及的一切话题,如宗教、科学、领袖、革命、哲学、政治都是在为吴亮提炼命题、探寻意义提供切入口。特别是当阿诺们因为某个话题而产生分歧的时候,吴亮的思辨会变得异常活跃、激烈。这样的细节,可被视为吴亮自我质疑、自我辩论思考行为的隐喻。吴亮故意为自己的思考设置障碍和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需要缠绕、复杂的思辨过程将意义寻求推向更高的层面。
四
在《朝霞》的开头,吴亮说:“我们每个人的阅读史,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在

象,并借助语言创造来完成私密的转换。也即是说,她终究还是回到了对现实的思索里,不管是出于感念,还是悲悯,其文字也透出了爱的清明与觉悟。她在诗中曾几次写到虫子,一次是虫子咬坏了苹果,“被虫子秘密啃食过的果子/伤口藏在内心/吃到最后才能看到/一块触目惊心的疤”;一次是虫子们在九月大地上的合唱,“卑微的虫子啊/一生中会有这么一场合唱/来证明自己生之响亮 生之阔大……”我们从这些诗作中,能真切地体察到诗人并无多少憎恨和抱怨,她理解虫子的生活,也从更高远的包容里认同了虫子的命运。我相信,诗人并不是刻意为之,她代替虫子在为生命记录曾经走过的旅程,这种自然书写早已超越了复制,而是在观察和感悟中重建了诗的信念。
从自我到自然,再从自然回到自我,诗人往往易于在这相互的循环中捕捉人生的诗意。如她自己所言:“诗歌的意义很多,但都与社会、内心与个人情感相关。读好诗让人内心或平和,或痛楚,写诗让人的内心变得灵敏而柔软……诗歌作为一种小众文学,没能拯救苍生。但是对于写作者个人而言,它是一场积极的消融与修炼。”当她以敏感的天性去图解那些或平淡或独特的存在时,她其实是在为自我寻找敞开的路径,在此,敏感于她或许不仅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能力。窗外两只灰斑鸠的叽喳,也能引起她的回望与内省,“有时候我厌弃自己/好像肉身已活得太久/每一日,我用清水、蔬菜和鲜果/喂养它。里面却住着一个/哀泣的灵魂”,这是敏感的诗人从自然物事里得到的

传统,独一无二的传统,不可替代的传统,写作就是把自己的传统想办法传递出来,让它成为一个物质存在。”可见,吴亮是想通过《朝霞》的写作完成一次思想上的自我梳理和总结。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阅读通过文字把各种各样的故事传递给我们,经年累月,我们忘记了大部分故事却记住了语言文字。”正是因为吴亮意识到“故事”的不可靠,他才虚写具体的经验和事件,把文字及其携带的意义推入近景并凸显出来。尤其当吴亮清醒地意识到,他的精神自传起源于“文革”这段荒芜的岁月时,他就会更加倾心于用他几十年来的思考来将这段岁月中的“苍白对白,庸庸碌碌,纷繁、凌乱、无秩序、琐碎、普通,大段不值得回味的段落,经不起的分析”转化为意义、秩序和价值,让断裂的历史重新与当下建立关联:“你可以抚摸灵柩,你看到了大限在此,那边无限。”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吴亮虚写那段岁月里的具体经验,除却因为作为思想者的吴亮不想让这些具体经验滑向老生常谈的价值判断框架,可能还由于我们身处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经验中所包含的禁忌和陷阱并没有给“红旗下的蛋”留下多少话语空间。
她领悟了生活之艰辛,也懂得了人世之悲苦,但她还是清醒地生活着,在自然天地间追问与前行。虽然每个人都会遭遇人生的瓶颈,但不同的个体会有不同的回应,就看我们以何种态度来对待那些困境了。当母亲不辞辛苦地为她看孩子时,她也能体会到那难以言说的母女情,于是,她将孝道当作秘密写进了诗里,“妈,我正在攒钱啊/等小宝再大点/我就带你去旅行/上海也好,北京也好/任你选——”这个秘密终究没有对母亲说出来,她是希望以此保存一个念想,也给自己留有一份期望。亲情的可贵,有时就在这“一切尽在不言中”的人生领悟里,诗人不仅打动了自已,也让我们获得了情感的共鸣,包括那首《我没见过她穿旗袍的样子》,对外婆的怀念和追忆,真正写出了一种爱的心声。
诗人的敏感,有些时候还表现在反思中,当更多的日常见闻与感想进入笔端,自我审视可能就成为了一种精神自觉。熊曼同样也不例外,尽管她钟情于自然,感动于生活,但其更注重的或许还是人生与时代碰撞的真相。她可能没有像一些诗人那样以愤怒来介入现实,但她依旧保持了一种言说的勇敢,这种胆识会让她下笔即见力量。就像她在傍晚去买一支唇膏时,也不忘罗列选择的艰难,这是生活本身的纠缠,但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生活在这点滴的取舍与困惑之中?她将生活过成了童话,但这童话里又不乏深沉的人文情怀,因此,她的诗看似有着女性的轻逸温婉,但简洁修辞的背后还是不乏厚重的精神底色,且带着生命哲学的意味。

